

## ◎ 第一讲

# 在民主革命中孕育和诞生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由继承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的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于 1948 年创建，至今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民革在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进步，做出了贡献，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由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所组成的政治联盟，是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力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中的参政党。

## 一、孙中山缔造中国国民党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逼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富于爱国和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为了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起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

革命的运动需要革命的领袖。19 世纪 90 年代初，在旧式农民革命屡遭失败，资产阶级革命即将兴起之际，中国民主革

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站在时代的前列，担负起了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

孙中山早年曾赴檀香山求学，后又在香港学医，深受西方教育的影响。他十分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苦心求索救国门径。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以“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最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

兴中会成立后，一方面积极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另一方面积极发动武装起义。兴中会的反清革命活动，在全国及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了华兴会、光复会等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相继成立和中国民主革命高潮的兴起。

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孙中山认识到，兴中会已不能适应需要，必须“招集同志 合成大团”将全国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政党，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1905年8月20日，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同盟会将“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作为自己的革命纲领。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以领导中国民主革命为己任的孙中山相继发表了《民报发刊词》、《军政府宣言》、《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等一系列文章，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基本内容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族主义”其基本内容是“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即以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建立一个“中国人之中国”；民权主

义“其基本内容是‘创立民国’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其基本内容是‘平均地权’即逐步实现‘土地国有’后达到‘为国民所共享’之目的。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首先在武昌发动起义，并很快攻下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随后，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趁势举行起义，相继有14个省宣布独立，形成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1911年12月29日，全国17个省的代表在南京集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紧接着，孙中山又领导组建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至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经历了近20年的艰苦斗争之后，终于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了共和国。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革命的胜利成果却很快落入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手里。

1912年8月25日，宋教仁在黄兴的支持下，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党，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想以国会多数党的身份出面组织“责任内阁”以推行自己的政策并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孙中山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被推举为理事长。在1912年11月开始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胜。1913年3月20日，正当宋教仁准备北上组织国民党内阁的时候，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车站。

宋教仁的被暗杀，宣告了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在中国的破产，使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警醒过来，重新举起了民主革命的旗帜。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根据孙中山的指

令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宣布江西独立，从而开始了“二次革命”。接着，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等省也先后参加讨袁。由于力量相差悬殊，加之讨袁军内部涣散和缺乏后援，致使“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出走日本。在日本期间，他深刻地反省和总结了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因而决心重新集结革命力量，继续开展反袁斗争。1914年7月8日，经过孙中山半年多筹组的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

1915年底，蔡锷在云南发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孙中山立刻领导中华革命党在全国各地兴兵响应，迫使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并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可是，袁世凯死后把持北京政权的段祺瑞，依旧坚持军阀独裁统治，拒绝恢复《临时约法》。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高举起了“护法”旗帜，号召“拥护约法，恢复国会”。9月，他领导组建了广州护法军政府，并以军政府大元帅名义颁布讨伐令，发起了护法战争。然而，参加护法军政府的西南地方军阀和部分政客却别有用心。为了排挤主张积极讨伐北京政府的孙中山，他们串通一气，于1918年4月操纵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并愤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均遭失败。经过认真而痛苦的思索之后，孙中山认识到，只有加强革命党的建设，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推翻

军阀专制统治。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发出通告宣布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在随之而发布的《中国国民党规约》中他又恢复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规定“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中华革命党虽然改组成了中国国民党，而且在政治纲领、组织制度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但由于缺乏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更进一步认识，没能提出完整、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也没有使中华革命党所存在的成员纷杂、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和缺少中坚力量等现象，得到切实和根本的改变。这一切都表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 二、中国国民党改组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919年5月4日，正当孙中山在上海专注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之时，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影响，使他初步认识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促使他重新认识民族问题和恢复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

1920年10月，陈炯明奉孙中山命令，率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成功。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1921年4月重新召集的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广东革命政府大总统。10月，孙中山趁胜利统一两广之势，决定进行北伐，以武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

1922年6月，正当北伐军攻克江西赣州，准备直取南昌之时，陈炯明突然在广州发动叛乱，包围总统府，并炮击孙中

山住所。孙中山在仓促脱险登上永丰舰指挥平叛未成功后，被迫离粤赴沪。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告失败。

陈炯明是 1909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的老同盟会员，长期追随孙中山，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因此，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极为痛楚，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就在这时，共产党人向他伸出了帮助之手。

1922 年 6 月 15 日，针对陈炯明的叛乱，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谴责陈炯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行动，使彷徨和苦闷中的孙中山深为感动。

1922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帮助、促进和推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此前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及马林等多次与孙中山会见，向孙中山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建议他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并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

在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下，孙中山认识到了国民党所存在的众多根本性缺陷，认识到了他屡次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认识到了一个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一个联合各阶层群众的坚强革命政党对于革命胜利的重要性。他欣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定实行“联共”政策，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

1923 年 1 月，孙中山与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在上海多次会谈后，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正式确立“联俄”政策。接着，作为“联俄、联共”政策的必然延续，孙中山又确立了

“扶助农工”的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孙中山从旧三民主义转变到了新三民主义，实现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和最为重大的思想转变。

在确定三大政策的同时，孙中山又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从 1922 年 9 月起，他先后在上海三次召集有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组会议，制定了改组计划，并成立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改组方案和党纲、党章。1923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了革命要依靠工农和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思想。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

1923 年 1 月，在孙中山的策动下，滇军和桂军各部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 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新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同时继续推进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3 年 6 月，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共三大的这一决定，使更多的共产党员加入到了国民党内，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3 年 10 月 18 日，孙中山委任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具体帮助和指导国民党改组。10 月 19 日，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10 月 25 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会上特派廖仲恺等 14 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临时中央执委会顾问，并责成临时中央执委会负责国民党的全面改组工作。11 月 25 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

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表明了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的决心与信心。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下召开的，到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10%以上，其中李大钊还被孙中山指定为主席团的五位成员之一。孙中山在大会上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反复强调大会要坚持“联俄、联共”的原则，把握方向，维护团结。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在正确分析中国现状的基础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提出了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纲领，并据此确立了国民党的一系列内外政策。

宣言还以三大政策为基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一是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二是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遍的、革命的民权，使民权为一便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并且由国家经营管理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的企业，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宣言还强调，国民党对于农民工人的运动，要“以全力助其开展”。

国民党一大宣言是国民党一大制定的最重要的文件，它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奋斗目标，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制定了以三大政策为灵魂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使之成为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统一战

线的共同政治基础。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由 41 人组成的中央执委会里，有李大钊、谭平山、张国焘、毛泽东等 10 名共产党员。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基本完成和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它是共产党人帮助的结果，也是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发展的必然产物。改组后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盟。

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同时，孙中山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建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着力进行革命武装的建设。之后，又平定了广州商团叛乱和进行了第一次东征，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初步稳定。

孙中山还致力于三民主义思想的完善和理论研究工作，系统阐述了新三民主义的深刻内涵，并且发展了原先对民生主义的解释，明确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承认农民应该拥有土地。

就在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孙中山在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主持大计”期间，不幸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逝世后，原本就因对待三大政策的态度不同而出现左、中、右派政治分野的国民党内，矛盾与斗争日益公开化。以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

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坚持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各项政策，密切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继续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廖仲恺等人的活动触怒了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1925年8月，邹鲁、胡汉民等右派指使凶手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处于十分危急之中。

1925年11月，邹鲁、谢持、张继等10余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本党党籍案》等一系列反共决议。会后，他们又在上海另立中央，企图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对抗。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和分裂活动，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进行了坚决的回击。1925年12月，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决定立即召集国民党二大来解决这一问题。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斗争下，国民党二大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坚持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坚持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各项政策，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分别给予了党纪处分。

国民党二大坚持孙中山的革命政策，打击了右派分子的分裂活动，维护了国民党的团结，促进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由于大会在对待国民党右派的态度上采取妥协退让的立场，使得国民党新右派基本没有被触动，其首要人物蒋介石还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继而成为中央常委，之后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从而使他进入了国民党的最高权

力核心。

国民党二大前后，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先后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和南征，完成了广东全省的统一，并促成了两广的统一。同时，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更加高涨，极大地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使大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然而，在这大好的革命形势下，蒋介石加快了反共步伐。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随后在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决议案》迫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及其他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辞去职务，而他自己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军大权。

1926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动员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正式开始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北伐军进展迅速。到1926年底已先后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部也已控制西北地区。

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长江以南的全部地区都为北伐军占领。

就在北伐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蒋介石越来越公开显露了他的反共面目。1927年3月26日他到达上海以后，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支持下，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政变之后，他又指使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国民党右派相继以“清党”为名，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以同年初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抗。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反共势力积极响应。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并在“分共”中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规模空前的中国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最终归于失败。

### 三、中国国民党的分化与 爱国民主力量的集结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意味着国民党反动集团已经公开背弃了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沦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对此，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高举孙中山的旗帜，继承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坚持三大政策，同背叛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四一二政变”后，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迅即对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暴行进行了严厉谴责。1927年4月17日，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推动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电，宣布“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并命令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

治”。4月22日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毛泽东、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董必武等共产党人一起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为，直斥“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 本党之败类 民众之蠹贼”，号召全国民众、全体党员和全体革命军人勇敢地站出来，与蒋介石叛变革命、分裂国民党的反动行为作坚决斗争。

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在得知汪精卫决意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毅然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厉谴责汪精卫集团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和背叛革命的罪恶行径，认为国民党已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她还在声明中严正宣布：“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以后她又多次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种种行径，号召一切忠于孙中山革命纲领和政策的国民党人继续坚持斗争。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响应和支持。宋庆龄等还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

1927年8月下旬，宋庆龄为了表明自己和国民党民主派坚持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立场，同时也为实现孙中山生前访问苏联的愿望，决定赴苏联访问。在8月22日发表的《赴莫斯科前的声明》中她再一次痛斥了“国民党冒牌领袖们”违背三大政策，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逼走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朋友的反革命行径，重申自己坚持三大政策的坚定

立场，相信“虽然有些人已经投靠了反动势力与反革命，但是，还有许多人将继续忠于孙中山为指导与推进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9月初，宋庆龄抵达莫斯科后，又陆续发表一系列声明和文电，进一步揭露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本质，表达了坚持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民主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11月1日宋庆龄又同邓演达、陈友仁联名在莫斯科联合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斥责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已成为“旧势力之化身 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倡议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推翻蒋介石集团，使国民党重新成为坚持孙中山革命精神和原则、坚决执行孙中山革命政策的革命政党。

与宋庆龄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相呼应，何香凝等原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也积极开展了反对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斗争，明确表示绝不同孙中山先生的背叛者合作，并号召一切坚持孙中山革命精神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士勇敢地站出来，同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以后，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斗争，对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背弃三大政策、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反动实质，促使更多的国民党人士成为民主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借口侵占沈阳。随后几个月内，日军便占领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并开始向热河进攻。一时间东北沦陷 华北危急 中国面临着日本帝

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可是，在这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国民党统治集团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依然倾其全力进行反共内战。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这种行径，遭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围绕着是停止内战、积极抗日，还是坚持反共、对日妥协所进行的斗争，国民党内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民主派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等不断发表言论，揭露和谴责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反共内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反动立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动员各界同胞抗日救国。他们的爱国行动，在全国及国民党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2年12月，由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并得到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蔡元培、杨杏佛、史量才等人大力支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正式成立。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斗争，在保障人民抗日民主权利、反对国民党政府非法拘禁和杀害爱国者、营救政治犯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33年3月，民权保障同盟与上海20多个社会团体一起，组成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派出军队北上收复东北和热河，保卫华北，并立即武装全国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包括一部分实力派，因不满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奋起抗日。1931年10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在黑龙江率部抗击日本侵略者，给日军以重创。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侵略上海的战争后，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领导第十九路军，违抗蒋

介石的命令，同上海人民一起，英勇抗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1933年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帮助下，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这些抗日爱国行动，虽然最后都被国民党统治集团所破坏，但却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抗日军人的士气，振奋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获得了世界进步舆论的赞扬，同时也推动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发展。

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是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抗日反蒋力量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一次重大集结和联合斗争。1933年11月，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联合李济、冯玉祥、陈友仁、李章达及第三党的黄琪翔、章伯钧等人，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举李济深为主席。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号召“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国民党”并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进行联合抗日反蒋斗争。这次斗争最后虽然在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大力镇压下失败，但它是爱国民主力量第一次在公开打出抗日反蒋旗帜的情况下，同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的外部对抗斗争形式，标志着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斗争有了新的发展。

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进行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5月，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正式在上海成立。总会成立后，各地纷纷建立分会，迅即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武装自卫运动。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积极响应。

1935年秋，以原第十九路军干部为主体，同时包括其他方面抗日爱国人士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大同盟推李济深为主席，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等组成中央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大同盟成立后即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立即缔结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共同解决民族危机。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同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一二九运动”的推动、影响下，各界人民纷纷成立抗日救亡组织，许多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积极参与了抗日救亡组织的创建工作。1936年5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各地救亡团体，组成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15人被选为常务委员。11月，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7名救国会领导人，制造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震动，群情愤慨。宋庆龄、何香凝等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宋庆龄等还亲赴苏州，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冯玉